

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系列·理论篇

村庄大转型

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

毛丹等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庄大转型：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 / 毛丹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11

（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系列·理论篇）

ISBN 978-7-308-06359-3

I. 村… II. 毛… III. 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浙江省
IV. G912.82 D6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495 号

村庄大转型：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

毛 丹 等著

出品人 傅 强

丛书策划 徐有智

丛书主持 袁亚春 王长刚

责任编辑 王长刚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66 千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359-3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赵洪祝			
副主任	夏宝龙	王国平	巴音朝鲁	李 强
	黄坤明	郑继伟	张 曦	
成 员	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 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钟桂松	陈 荣	林吕建
	郑仓元	童 健	胡祖光	梅新林
	许 江	邵占维	张金如	陈德荣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张鸿铭	陈荣高		

“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黄坤明			
副主任	沈立江	陈永昊	胡 坚	陈 荣
成 员	舒国增	陈一新	顾益康	姚先国
	史晋川	马力宏	盛世豪	朱家良
	葛立成	毛 丹	汪俊昌	曾 骅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陈永发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懈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

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and 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

魏洪祺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

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 10 余个系列 400 余项研究课题,完成 230 项课题研究,出版 200 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 年 6 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 年 9 月 10 日于杭州

目 录

第一编 导 论

(本编作者:毛丹)

浙江村庄的大转型	3
一、村庄转型:一个观察农村变迁的视角	3
二、观察维度一:村庄与市场	8
三、观察维度二:村庄与国家	21
四、观察维度三:村庄与大社会——作为议程的社区衔接	30

第二编 村庄经济:市场、集体、农户关系转型

(本编作者:彭兵)

编前语	37
第一章 农户与集体:村庄生产关系的调整	41
一、农户经营模式的转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41
(一)一般背景	41
(二)从大锅饭到定额管理、小段包工	43
(三)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実施	44
(四)缓进的某些合理考虑	46
二、稳定土地制度	47
第二章 市场经济的导入	50
一、农产品购销模式的转变与影响	50
(一)从统购、派购到粮食补贴	51
(二)非粮食作物多元化	57
二、乡村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市场能力提升	60
(一)乡村工业的复苏与乡镇企业发展	61

(二) 从乡土企业到现代企业：乡镇企业的改制与民营经济	63
三、市场化进程与村庄集体经济	69
(一) 集体经济经营方式	69
(二) 功能转换与村庄转型	72
第三章 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户经济	74
一、农户经营结构的变化	74
(一) 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的集中	74
(二) 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合作	77
(三) 农民就业结构、收入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变化	81
二、劳动力市场化的冲击	86
(一) 从农户到劳动力的演化	86
(二) 劳动力流动	88
(三) 城市化、小城镇建设的拉动	91
三、农业经济的大转型	93
(一) 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崛起	94
(二) 林业、渔业升级	96
(三) 观光休闲农业开发	99
(四) 全球化视野中的浙江农业前景	101
第四章 新型村庄枚举	107
一、小康明星村	107
二、古村的变化	109
三、融入城市的村庄	110
第五章 武装农民进市场	112
一、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公共投入	112
(一) 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	113
(二) 对“三农”的财政投入	114
(三) 从减轻农户负担到取消农业税	116
二、传统农业的科技改造	118
三、农村合作社：农户组织化进市场	120
四、农民的社会保护	124
(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124
(二) 农户社会保障	125
五、提高进城农民的权益保障	126

第三编 村庄政治：乡土型公共领域的生长

(本编作者：胡文本)

编前语	131
第六章 村庄治理：后发展国家的难题	132
一、“国家—社会”的四种关系模式	132
(一) 国家监理型	133
(二) 国家强主导型	134
(三) 国家弱主导型	135
(四) 国家范导型	136
二、浙江村庄治理的模式转换及其资源	136
(一) 作为国家政权末梢的乡村基层	137
(二)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层单元	137
(三) 作为公民社会雏形的农村社区	139
第七章 乡村自治与乡村再组织的进程	146
一、乡村再组织：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	146
(一) 村民自治的一般进程	147
(二) 村民自治在浙江的发展过程和样式	149
二、村庄治理的新问题	153
(一) 以浙北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发展及其改制效应	154
(二) 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及其改制影响	159
(三) “新富参政”与村社区的重新组织	161
第八章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创新(1998—2008)	164
一、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创新	164
(一) 探索权力构成的民主选举机制	165
(二) 建立“协商民主”的民主决策机制	167
(三) 实践村级治理的民主管理机制	169
(四) 构建公共权力的民主监督机制	171
(五) 完善社区发展的综合治理机制——与时俱进的“枫桥经验”	173
二、政府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	176
(一) 住村指导员制度与大学生任村官制度——新农村建设的 人才保障	176

(二) 加大财政反哺力度——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财力和 物力支持	178
三、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学解读	181
(一) “强国家”的治理态势	181
(二) “强社会”的发育雏形	182

第四编 乡村社会：迈向城乡衔接

(本编作者：张丽萍)

编前语	187
第九章 村庄和大社会的链接	189
一、城乡一体化：从乡村化时代走向城市化时代	189
(一) 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	190
(二) 城乡统筹中的村庄	194
(三) 以小城镇、中心镇为依托的城乡一体化道路	199
二、城乡互动与城乡社区衔接	203
(一) 城乡流动——四通	203
(二) 改革开放以来重要农村政策的变迁：从全国到浙江	205
三、新世纪衔接城乡系列行动	217
(一) 通往小康：城乡经济均衡	217
(二) 基础设施和乡村整治	221
(三) 乡村环境整治	225
(四) 城乡福利均等化	229
(五)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231
(六) 乡村文化：从“送文化”到“种文化”	232

第五编 地方政府与村庄趋向

(本编作者：任强)

编前语	237
第十章 浙江村庄转型的形态特征	239
一、家庭经营的转型及其后果	240
(一) 农业经营家庭(纯农户)	242
(二) 兼业家庭	242
(三) 非农家庭	243

二、集体经济与村庄形态的变化	247
(一) 紧密型村庄	247
(二) 松散型村庄	248
第十一章 浙江村庄转型的三元动力	251
一、充满活力的农民	252
(一) 爱“冒险”的农民	252
(二) 作为市场中介组织的民间社会发育	255
(三) 尊重实践智慧的地方政府	257
二、有领导的发展	258
(一) 引导多元的发展单位: 建立城乡关系的新模式	260
(二) 重要的是土地使用权, 而不是所有权	262
(三) 指导下的合作	264
(四) 建立有效的辅助系统, 武装农民进市场	268
(五) 农业与工业的互促发展	271
参考文献	273
征引文献	273
其他参考文献	283
浙江村庄变迁大事记	295
跋	400

浙江村庄的大转型

一、村庄转型：一个观察农村变迁的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与转型的30年实践,正在冲击我们所熟悉的农村、农业与农民理论。有些冲击显在而有趣,足以直接改变成见。例如,通常认为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时代的国家或地区,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改造会充满经济、政治与社会的震荡,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瓶颈;基本结局则是农村衰落,大批农民转移为城市人口,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减少并经历现代化改造。但是,中国农村改革却是整个国家改革中最活跃的部分,农村30年间的进步总体上也没有伴生农村衰落现象,反而有可能趋向于2004年联合国治理理事会“人类居住项目”第19次会议所期望的城乡联结模式^①;通过农业耕作、非农经济以及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继续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尽管大量人口还在农村,但是贫困人口却急速减少。为此,2008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把中国视为全球减贫最成功的国家,认为“过去十年,农村地区的贫困率得到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举世瞩目的减贫成果”^②。在世行看来,这是一个很

①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Urban-Rural Linkag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94—2004*. UN-HABITAT, 2004.

② 该报告指出:根据每天1.08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计算,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贫困率仅从1993年的37%降至2002年的30%;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贫困率仅从35%降至32%,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仅从10亿减少到9亿。按照每天2.15美元贫困线的高标准计算,贫困率仅从78%下降至70%,贫困人口仅从22亿减少到21亿。相比之下,(1)过去25年,中国农村减贫成就为全球最高。1981—2001年,中国的贫困率从53%降至8%,5亿人摆脱了贫困。(2)中国的减贫成就主要归功于农村人口减贫。1980—2001年,中国农村贫困率从76%降至12%,农村减贫取得成就约为整体成就的四分之三。(3)农村地区贫困率的大幅下降主要归功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停留在农村地区人口的实际贫困率降低,而不是源自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参见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胡光宇、赵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7页)。研究者具体指出:1981—198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锐减,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农业体制与政策的改革激发了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改革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政府采购价格的提升和部分商品的价格自由化等;部分则得益于高产量杂交水稻对于农业产量的急剧提升(同前,第52页)。此后,改革开放的农村非农经济领域又提供了农业闲置人口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但是,有些研究者明确认为,纵观全过程,工业和服务业对减贫的贡献不能与农业增长的贡献相提并论(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82(1), pp. 1—42)。

好的例证,说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小农户作用、以农业促发展是明智选择。

然而,也有一些冲击显得影响深远、复杂而足以引发歧见。例如,中国农村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固然应该被赞誉为“静悄悄的革命”或“无声的革命”^①;但是,站在反对过于信任市场力量的角度看,中国农村远未经受布洛维所谓市场化“第三波”的冲击^②,仍然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能否最终从一个农业国家成功转型为现代化、城市化国家,仍将取决于能否排除农村面临的风险,包括进一步在农村确立起市场与经济、社会的恰当关系。

这类情况表明,中国农村30年的变化尚有待于系统分析。而且,由于农村的变迁仍处在展开过程中,这种分析一方面是如何推进农村改革实践的 necessary 思考形式,另一方面则极具理论生趣和挑战性,甚至分析问题的视角本身都还有待审议。

在研究者现在提供的各种观察农村30年变迁的视角中,有两种很有代表性。第一种是农业部官员新著《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所代表的朴素归纳类型。该书指出:30年农村改革,(1)就主要内容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农村经历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乡村治理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发展小城镇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等”。(2)就主要成就而言,“中国的农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由此,农村生产力得到发展,农业结束了短缺时代,农业生产结构从种植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 and 非农产业带动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促成农民收入的来源多元化和较快增长,农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村经济社会进入建设新农村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3)就主要动力而言,“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构成了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的两个车轮”。(4)就主要经验而言,包括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循序渐进。(5)就未来

① Goodman, David S. et al.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New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1994. 刘亚伟编:《无声的革命——村民直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趋势而言,需要从“农”字本身、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全球化背景三个层次考虑“三农”问题,等等。^①

以上归纳显然能够罗列农村 30 年间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项,能粗略呈现中国农村改革与农村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的特点。不过,相对于中国农村转型复杂的内涵和过程及其面临的新困难或不确定性,这类归纳在理论上是否显得有点简单?

第二种视角,可以 2008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例。该报告提出了“农业国家转型”的概念,其中涉及中国的大量篇幅体现了基于经验与数据之上的概念化描述特征和理论抽象力。该报告认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可划分为三类:(1) 传统农业国——农业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 32%;大多数贫困人口(70%)居住在农村。这类国家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其农业转型的主要目标则是加快发展、减少贫困和加强粮食安全。基本议程可以表述为:提高市场准入,发展现代销售链;实现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革命,重点帮助糊口型农民进入市场,发展可持续的资源管理机制;保障糊口型农民的生计和粮食安全;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发展农村非农产业而超越农业。(2) 转型中国家——农业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 7%;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滞留在农村。中国、印度、越南、摩洛哥等国家都属于典型的转型中国家。这类国家农业转型的主要目标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农村贫困。基本议程是:根据城市人口收入增加和饮食结构变化所引发的“超市革命”(即国内消费成为农业的主要需求方,并且大多数农产品通过超市流通),发展新型农业,提倡生产高价值农产品,引导小农从土地密集型作物转向多样化经营;在落后地区推广绿色革命,并为农村留守人口提供安全网,鼓励无地和少地农民从事养殖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持;促进同城镇联系在一起的农村非农发展,用大量投资提高劳动者技能,帮助他们转入快速增长的经济领域。(3) 城市化国家——农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更低,平均为 5%;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市。大多数拉美国家、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类国家,以农业促发展仍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其总体目标是把小农户与新的食品市场联系起来,并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其基本议程则是:将小农引入新的粮食市场,让小农通过获得土地、研发、培训、技术援助、金融服务和农民组织等途径而获取更多资产;改善糊口型农民的生计,提供

^① 宋洪远主编:《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36—40 页。